

大陸社會動員的理論探索與建構： 以「法輪功事件」為例

歐陽新宜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四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本文從社會運動理論的視角切入，將中國大陸的社會情勢區分為「結構崩解式」的與「資源動員式」的兩種類型。又從是否支持現有政權的角度出發，將大陸的群眾運動區分為「向心力」與「離心力」的兩種類型。這兩種分類的交叉綜合，本文建議了一項區分「發展」與「動亂」的暫行性中國大陸社會情勢分析與理論架構，並從動亂的角度分析最近發生在中國大陸的社會群眾運動。

由歷史與官方文獻資料研判，中國大陸的社會運動一直具有強烈的「議題設定」與「動員色彩」，也一直被具有政策制訂權的官方主導，而由後繼者以「動亂循環論」的觀點嫁禍以脫責。「法輪功事件」可能是中共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由「非官方主導」的「自主性」的群眾運動。被認定非法，也因此成為一項嚴重的「離心力」社會動亂事件。然而由「資源動員論」的分析中，並不排除此一事件將來受到「保守陣營」的利用，走向「體制內的動員」，成為另外一次「動亂循環論」用以嫁禍或脫責的犧牲者。此一團體能否發展成為獨立的「民間勢力團體」，有賴於他們的同盟策略、外力援助以及是否有接受暴力鎮壓的準備與堅持到底的決心。它的「體制外」走向，則可能產生一個真正「自主性」的非共民間勢力團體的出現，造成中共政權的重大衝擊。

關鍵詞：社會情勢、社會條件、社會動亂、社會運動、資源動員論、法輪功事件、自主性社會團體

* * *

一、前言：中國大陸運動再現

早在今年中共九屆「人大」開議以來，中共官方與學者就因為今年是「五四」八



十週年、「六四」十週年、西藏動亂四十週年，爲了確保大陸「建國五十周年大慶」以及澳門「回歸」的平穩順利，不約而同的對所謂「社會穩定」的問題表示關切^①。譬如，中共最近一段時間把「十四大」以來高唱，「嚴打敵對勢力活動」、「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又重新搬上了檯面^②。中共「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室」主任、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最近應美國哈佛大學邀請時，也特別指出，大陸目前已進入了「極其特殊和關鍵的歷史時期」，這是社會內部矛盾不斷累積的必然結果。胡鞍鋼並且「律定性」的指出，這些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社會因素」，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出現社會不穩定的高峰期，並且發生某些重大的事件^③。

從社會勢力（social force）或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的理論來看，以上「十年動亂循環論」的觀點將社會動亂的發生歸因於「社會結構的變化」，是屬於典型的「社會結構崩解論」^④。「社會結構崩解論」有三個分支：他們認爲結構導因、經濟蕭條壓力、信仰系統的傳播、行動動員、環境因素與社會控制機構的能力之強弱是造成社會動亂的主要因素。像 Charles Johnson 就採用此一觀點，對中國革命的變遷進行了有名的「挑戰與回應」研究；認爲高的自殺率、政治犯罪率、軍事鎮壓與理想主義運動會讓革命發生。國際展示效果（international demonstration effect）是第二種結

註① 「新華社」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引述賈春旺在南京結束的大陸公安廳局長會議上的談話指出爲確保大陸今年「建國五十周年」大慶及澳門主權移交慶典活動的安全，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下，中共公安部已要求各級公安機關，今年要以維護社會治安及政治穩定爲主要任務。

註② 孟南，「1988年的大陸社會情勢」，中共研究（台北），第三十三卷第一期（民國八十八年一月），頁八八。

註③ 譬如，胡鞍鋼指出，中共三次社會不穩定的高峰期是：第一次社會不穩定的高峰期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當時，大陸在文化大革命後對「經濟進行重大調整」，大批知識青年從農村返回城市，造成失業率猛漲，政治上發生北京「西單民主牆」事件。第二次不穩定高峰期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大陸當時再次「實行經濟調整」，經濟嚴重衰退，通貨膨脹直接損害了普通人民的利益，腐敗現象十分突出，社會矛盾再次尖銳化，並且最後爆發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胡鞍鋼認爲，西元二千年前後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第三次社會不穩定高峰期。大陸目前正面臨著很多相互關聯的重大挑戰和不穩定的因素。這些不穩定的因素包括：出現突發性的失業高峰；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各種腐敗空前猖獗；甚至愈演愈烈；各類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他呼籲大陸各級政府要特別關注社會轉型時期的種種不利因素，並把它們逐步化解。「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它們就會削弱經濟的持續成長，從而嚴重影響大陸的發展。」見「學者警告大陸社會又將不穩定」，「中央社」新加坡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電；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轉載，第十四版。

註④ 社會運動（或社會動亂、革命）的社會結構崩解論（breakdown perspective）或稱爲社會心理學論（social-psychology perspective），有三分支：1）集體行爲論（Collective Behavior, Smelser, 1963）；2）社會地位不一致論（Status Inconsistency, Veblen, 1914）或國際展示效果論（International Demonstration Effect, Janos）；3）Ted Gurr（1973）對一一四個國家進行過會動亂的研究後，提出了「相對剝奪論」的看法。請參見 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H William Friedlan *Revolutionary Theory* (New Jersey: Allanheld Osmun & Co. Publishers Inc., 1982)；Thorstein Veble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14*；Andrew C. Janos, *Politics and Paradigms: Changing Theories of Change in Social Scienc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Ted Robert Gurr, "The Revolution-Social Change Nexus: Some Old Theories And New Hypothes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5 1973 pp. 359~392.



構論觀點的運用，認為「國際攀比」以及社會階層的不均衡分佈，是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第三種結構觀點由 Ted Gurr 提出，認為經濟發展與民衆期望之間產生的落差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主要關鍵，他的「相對剝奪論」與 J-curve 的理論特別有名^⑤。

巧合的是，最近幾件十年來中國大陸大規模的社會群眾事件^⑥，竟都在官方與學者發表「十年高峰期」的警告之後發生。而他們無論就規模或是激烈程度來看，都是近十年來所僅見的。事件之一是「北約誤擊大使館事件」所引發的全國高達二十萬人的學生抗議活動，「誤擊大使館事件」一時之間匯集了二十餘萬學生，各地、各校紛紛「自動組織」起來，反對「美帝霸權」的學生民族主義抗議活動，激烈暴力的程度不亞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卻在三天之內立即趨於平靜。國際媒體包括美國政府在內，一般皆同意這是「中共主導」的「具有社會動員色彩」的社會運動^⑦，而不是「社會結構崩解」所稱的是因為結構矛盾所造成的結構性動亂。

第二個例子是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發生的另外一項更引起中國大陸觀察者注意的群眾運動，那就是所謂的「法輪功事件」。其所以特殊是因為「法輪功」成員是由一個具有比學生運動更大「群眾基礎」^⑧的「半宗教民間信仰團體」所組成。他們所發動的一萬多人靜坐中南海，抗議被政府指為「邪教」的聚集是「繼六四學生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法輪功事件」到底是「結構崩解因素」下的產物？還是菁英策略謀式「資源動員論」下的產物？這是引發本文探究大陸社會勢力（Social force）與社會動員理論架構的主要動機。

這兩次群眾運動事件至少在兩方面引起注意：第一、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的消長（i.e., 社會勢力之變化）是否有如大陸學者所稱「十年一循環」的宿命之論？也就是「社會結構崩解論」所主張的「社會結構性」與「社會階層」的「非動員性」的社會勢力（social force）意義？如果不是，那麼中國大陸的社會情勢，無論是動亂性（chaotic）的還是支援性（supportive）的，包括各種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否具有「資源動員」或者「議題設定」的政治目的？；第二、這些令人矚目的大規模「社會運動」現象，提供了中國大陸情勢觀察者對於中共「社會動員」性質一個新的檢視機會，看看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中國大陸是否有「自主性」民間勢力團體（autonomous social force）發動社會運動之可能？一個「非政府主導」的「自發性」社會運動很可能會是「中國研究」界在探討了「極權分散化」、「非共社會勢力」、「市民社會理論」、「蘇東波效應」等議題之後，最具挑戰性的研究領域之一。

註⑤ 參考前註 Ted Robert Gurr 之書目。

註⑥ 例如「法輪功事件」與「北約誤射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抗議事件」

註⑦ 各方面對於中共主導此次學生運動的評論，請參見王銘義，「CIH；與北約導彈在北大相遇」，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六日，第十四版；另見 MSNBC 1999/5/17 報導，「China rife with conspiracy theories: Reaction to embassy attack shows Beijing's control on press」on <http://www.msnbc.com/news/269785.asp>；「轟炸使館另有隱情」，亞洲週刊，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頁三六～四九。

註⑧ 據估計，全大陸參加「法輪功」練功站的人數自六千萬至一億之譜，請參見本文表五。



二、社會動亂循環論的商榷

在探討這個群眾運動的性質之前，中國大陸近年來發展策略轉變的背景值得一提。中共官方與學界最近連續透露出對於追求穩定的訊息，似乎可以嗅出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重要路線觀點的轉變：第一、強調經濟發展外部因素的論調，如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開放市場、引進外資、爭取外匯，似有逐漸退居二線之勢；而內部因素，如國企改革、整頓治安、社會穩定甚至民主法治的呼籲，卻逐漸躍升為深入發展的重要議題^⑨。此一情勢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尤其是「亞洲金融風暴」的開始，中共就一再呼籲並強調其經濟政策應從「外向型」轉向到「內發型」的擴大內需方面來，就可以看出^⑩。其中尤以人民幣是否應貶值以刺激出口的問題，最具指標意義。第二，就內部因素而言，大陸社會不穩定現象的發生週期，和「新經濟政策」的頒佈時間息息相關^⑪。這種將社會穩定現象與「政策」掛勾的主張，極具政治議題設定意涵。不過，「政策調整」的時間與「政策負責者」之間的關聯性，則需作進一步的檢證，因為這與不同時期「議題設定者」的政治立場有關，而不同的政治立場者會對不同的議題進行設定^⑫。

一項數據可以說明中共將社會動亂現象與特定時間「政策」掛勾的政治意圖。中國科學院一九九八年四月所作的「國情報告」指出，「失業問題」將會在最近三年加劇（與一九九七年強調「地區差異」現象嚴重的國情報告迥異）。由於國有企業有一千萬人要「下崗分流」，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城鎮失業人口有一三〇〇萬到一五〇〇萬。到了二〇〇〇年，此一城鎮失業人口將增加到一五〇〇萬到一八〇〇萬，真實失業率將達到百分之七或八，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次失業高峰期」，將成為當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⑬。中國科學院的報告責怪當前失業問題是「第一代領導人政策失誤」所致，也就是指責目前失業問題是一九八〇年以前的人口政策所造成。可是我們從勞動力市場與人口政策之間的關連性觀察，依人口自然增加率的趨勢判斷，固然發現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三年是有一個就業高峰的現象（參見中共人口統計表）。由於二〇〇〇年以

註⑨ 關於中共改革政策的優先次序，請參考中共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文，特別是比較中共「十四大」與「十五大」之間的政府工作報告差異。「十四大」（一九九四）時仍以「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為「二十字總方針」；到了「十五大」前一年（一九九六），「愛國主義」與「穩定壓倒一切」的調子就甚囂塵上，對於與「對外開放」有關的議題，如「貿易談判」與「加入WTO」的態度，也越趨謹慎。另外，大陸學者對於當前（一九九九）的「國情」，也以富民、強國、民主和穩定為目的的「新政」為強調的重點，而不再提「對外開放」。見前引胡鞍鋼文。在外交政策方面，則請參看尹慶耀，「中共當前對外政策的幾項重要內容」，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五卷第四期（民國八十八年四月），頁四一～五四。

註⑩ 參考中共領導人歷次對於金融風暴因應之道及人民幣是否貶值時的強硬談話。

註⑪ 同註③。

註⑫ 譬如，中國大陸社會不穩定高峰期的出現，究竟應由三十年前「第一代領導人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誤」負責（胡鞍鋼在一九九八年國情報告中所指責的），還是與十年前「市場經濟體制」政策上的失誤有關，或者是四年前「國企改革」、一年前的擴大內需、「新經濟政策」有關？就值得商榷。

註⑬ 中國時報，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第十版。



後三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勞工（十五歲），應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出生。當時正值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嬰兒潮），自然人口增長率從前一階段為的 1.1 % 突然增至 1.43 %。依照當時的人口基數（十億七五〇萬人口 * 1.43），每年自然增加的一五〇〇萬勞動人口數確實將造成一項標準的「社會問題」^⑭。然而，此一突然增加勞動力的現象並不適用在一九九八年。因為一九九八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十五歲）應在一九八三年出生，而一九八三的人口自然增加率卻只有 1.15 %，一九八四年更降至 1.08 %^⑮。一九九八年開始，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不到一二〇〇萬人，遠遠低於前幾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總人數，因此一九九八年就不應成為「第三次就業高峰現象」的開始。此處政治議題設定的意涵非常明顯，而可能的劇情假設是：由於朱鎔基的「國企改革」要在去年上馬，為了迴避失業問題的政治責任因此以責怪「第一代領導失誤」為基調的「勞動力高峰」的「政策工具」，就必須提早在一九九八年提出。

另外一項「時間序列」的文獻分析也可以說明中共在「社會情勢」發佈上的「議題設定」色彩。從中共官方歷年披露之社會問題序列中可以看出，因為中共「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而造成了「社會動亂」的邏輯似乎得到了強化。表一顯示，中共十年以來社會問題的發生是沿著以下的階段進行的：

- 一、一九九一～一九九三 社會運行機制（計畫與市場體制間的矛盾）問題最嚴重
- 二、一九九四～一九九六 通貨膨脹問題、收入差距問題最嚴重；
- 三、一九九七～一九九八 下崗工人失業問題成為近期社會問題的主軸；
- 四、一九九九年「政治、社會穩定」問題逐漸搬上了檯面

從「時間序列」的角度來看，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首先是從 1、運行機制（也就是資、社體制間的矛盾）所產生的；接著，因為市場機制的引入而發生了 2、收入差距（也就是勞動力報酬差距）問題；在追求企業效率（國企改革）的過程中使得冗員被裁撤，造成了 3、失業問題（下崗工人）的發生，最後則是因為 4、無業（城鄉剩餘勞動力）的遊民與流民帶來的社會穩定問題。有趣的發現是：上述中國大陸社會問題時間序列的進程與古典馬克斯主義的資本論觀點，竟然有非常類似的序列相通之處^⑯？即：資本主義社會首先發生於私有產權的普遍化、接著是生產工具之獨佔，失業問題的發生、企業效率的提升與生產規模擴大化、人口過剩問題之發生。最後，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失業大軍因而出現。如果按照胡鞍綱「十年一動亂」的邏輯，指責當前失業問題與社會動亂現象的政策負責者是：「第一代領導人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誤」的話，那麼中共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問題的總根源就應該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創始者鄧小平，而其罪名則應該是：「偏離社會主義路線」。那恰恰就是等於在說：社會動亂循環論的主要政策因素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使然？

註⑭ 社會問題的定義，請參見：Earl Rubing, Martin S. Weinberg, *Five Perspectives of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Oxford, 1981)。

註⑮ 歐陽新宜，「1998 年之中國大陸社會問題」，問題與研究（日文版），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頁八五中之人口表中有 * 的數列。

註⑯ 請參閱「資本論」 *Karl Marx Capital*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 1906)。



表一 中共歷年披露之社會問題

年度	文件名稱	發表時間	社會問題主要內容
1991	中國社會發展報告	1991.11	1、社會結構衝突顯化 2、社會運行機制磨擦加大 3、社會利益差別加大 4、科技教育發展滯後 5、社會失序現象嚴重
1993	社會情勢分析與預測	1994.1	1、社會矛盾加大 2、官員腐敗問題嚴重 3、中央地方關係緊張、城鄉差距明顯 4、社會價值、社會文明建設滯後
1994	社會情勢分析與預測	1995.1	1、物價上漲超過警戒線 2、農業棉糧生產形勢嚴峻，城鄉差距拉大 3、離退人員及低收入階層生活困難 4、社會治安問題多、反腐敗鬥爭艱鉅 5、教育、科研發展滯後
1995	中共關於「九五」計畫與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1995.10.	1、農業基礎薄弱 2、國有企業經營困難 3、通貨膨脹壓力大 4、產業結構不合理、就業壓力大，生態環境差 5、地區發展差異加大，收入差別懸殊 6、腐敗現象滋長
1996	社會情勢分析與預測	1996.1	1.經濟結構不合理 2.財源流失 3.農業增產基礎不穩固 4.通貨膨脹壓力大 5.貧困問題突出、貧富差距拉大 6.社會治安沒有根本好轉
1997	199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1998.3.4	1、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不高； 2、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薄弱； 3、國有企業經營困難，企業經濟效益低於水平； 4、下崗職工多，再就業壓力大； 5、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金融秩序混亂； 6、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困難。
1998	中國社會情勢分析與預測	1998.1	1、國有企業處境艱難 2、失業問題比較嚴重 3、城市低收入群體人數規模有所擴大 4、老齡化使社會保障面臨嚴峻形勢 5、貪污腐敗現象仍比較突出 6、都市地區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
1999	中國社會情勢分析與預測	1999.1	1、國企改革、職工失業問題 2、社會治安、假冒偽劣商品問題 3、政治穩定問題 4、農村農民矛盾問題 5、體制改革問題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社會發展報告，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1992~1999（北京：社科出版社）。

三、社會動員色彩強烈的中國大陸情勢

上述「經濟政策導致社會動亂」的命題，吾人固應區分「傳統階級鬥爭路線」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路線」、「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不同路線與政策之爭是否將導致不同的社會動亂型態。換言之，開放型的經濟政策與保守型的經濟政策，可能導致不同型態的社會運動。譬如，「六四」運動可能就與開放式的經濟政策有較高的相關；而「誤炸大使館抗議事件」可能就與保守型或內需型的經濟政策有較高的相關。可是無論如何，學者已經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的政策取向有其一貫性，並不因政策路線的差異而有不同。Andrew Walder 就指出這是「具有強烈的社會動員色彩的社會變遷現象」^⑦。換句話說，社會運動理論的第二個觀點^⑧——以人、菁英團體或者政策取向為探討焦點的菁英策略理論模式——「資源動員論」(resources mobilization theory)^⑨，可以被用來解釋中國大陸「動員色彩強烈」的社會情勢。

從歷史去觀察，中共社會情勢中的政策動員色彩實在很明顯。例如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反、五反」；文革時期的「四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改革以後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反腐倡廉」；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與最近幾年的「治安嚴打」運動，都是社會動員的例子。在經濟領域方面，「三面紅旗」運動固然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重要里程碑，就是「改革」之後，經濟型社會運動也未曾稍歇。例如，一九九五年間當大陸發生通貨膨脹且大白菜生產過剩時，中共就發動過全民吃白菜的「愛國大白菜」運動。最近中共在「人民幣貶不貶值」的問題上遭受極大的壓力，會不會發動「群眾運動」以因應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問題固然備受關切，可是最近才發生的外交領域「大使館抗議」事件，無論其目的是基於「民族主義情操」，還是「增加經貿談判籌碼」，

註⑦ Andrew Walder, "Social Change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5, pp. 405~424.

註⑧ 第一個觀點為結構崩解論，請參考註④。

註⑨ 「資源動員論」(resources mobilization theory)，也有三個分支：1) 歷史菁英論(如 Brienton 所寫的「革命的剖析」Anatomy of Revolution)分析英(一六八八)美(一七七六)法(一七八九)俄(一九一七)的革命之後，提出了知識份子、軍隊、政府之間的菁英衝突的理論；2) 階級同盟論。社會學家 Orum 相信，列寧的「如何作」，也就是「菁英統一戰線理論」是社會運動「資源動員論」的主要理論淵源。Barrington More 接續其觀點，認為革命過程中，團體的結盟遠比階級同盟來得重要。Charles Tilly 則是近代採用資源動員論的革命理論家。他認為，成功的社會運動導因於：主權的壟斷、意識的提升、統一戰線策略、設法消除鎮壓暴力、避免外力干預。此外，優秀的領導人才、統一的指揮系統、目標的精確、獎勵機制、外援與暴力革命的準備，也是革命成功的條件。前一陣子在「國家中心論」大放異彩的社會學家 Skocpol(一九七九)結合了結構論與資源動員論的觀點，仔細的分析了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之後認為：革命的發生都不能脫離三大因素：1、外在(環境)威脅、2、階級(或社會團體)鬥爭、3、菁英的統戰策略。其中，又以知識份子與農民對貴族官僚的抗爭情勢最為明顯。



卻再度彰顯了中共社會運動的「政府動員性」。值得一提是，直到最近以前，中國大陸社會都還沒有出現過「非中共政權」的社會動員者（social mobilizer），中共仍然是官方社會動員的唯一來源^②。因此中國大陸上的「社會動員」其實就與「中共政策的宣導」同義^③。

從動員論的觀點來看，中共官方與學者的言論無論如何客觀，都有政策工具的意義。那就是：中共「國家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的制訂，影響了中國大陸社會穩定的維持；爲了減少「新政策」施行上的障礙，政府與群眾就一定要努力「動員起來」去防止社會不穩定情勢的擴大。因此，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吾人對於「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的分析，實在不能只依據中共官方的政策與報刊文獻，否則就會重覆（repeat）、回應（echo）或「自證」（tautology）出與中共「動員者」所期望的結論。譬如，中共強調當前「失業問題」嚴重實在是因爲「國企改革」政策所造成的「工人下崗」保守阻力太大，而非失業問題果真「十萬火急」；然而因爲「國企改革」政策必須貫徹，因此「失業問題」就必須「立即上馬」、「勒令解決」；接著中共官方的媒體與研究報告就連篇累牘的塑造「當前失業問題極爲嚴重」的社會形象，以「傳達中央意見」，並動員群眾解決。

因此對於中共當前的政策與言論動向，除了應該特別注意其黨內外路線鬥爭的政治意涵之外，對於全面性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就業機會、治安穩定等等各項與「發展內需」相適應的「下層建構」社會情勢，也應該有全盤配套的觀察。在研究途徑（approach）上，除了觀察中共領導人在歷次「黨大會」、「人大」的政府報告，也應探討學者各種發表於研究期刊上的文獻，以及在各項學術討論會、研究專刊，各大學、研究機構及各次與「社會情勢」相關的「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的議題討論上^④。如果大陸社會情勢確如大陸學者所指出的是「逢九必亂」、「每十年一循環」會發生社會動亂高峰，那麼吾人應該不難發現，從一九九〇年以來，各項社會「情勢報告」中的分析文獻，應該有一個由高峰到低谷的「中國大陸社會穩定循環趨勢線」，並作爲進一步探討大陸上層政經情勢、決策過程與此一「下層社會結構」基礎的因果關聯。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四、社會勢力的分析架構

探討中共官方社會穩定分析文獻是否具有「一致性」（consistency）的最佳途徑（approach），可能須從龐雜的官方文件、報紙社論、研究期刊的全面文獻中，隨機抽樣

註② 中共內部雖有因「路線鬥爭」，而發生的派系性社會動員，如文革時期的「毛劉衝突」與六四時期的「李（鵬）趙（紫陽）衝突」，卻不影響「中共動員者」角色。至於類似四川農民白條抗議事件，則是小規模的例外及社會結構崩解前的「火星」現象。

註③ Andrew Wlader,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June, 1995) pp. 309~328.

註④ 或有評論稱中共資料的真實性若有問題，何以可以據爲論證之基礎？吾人的回應態度是，從相對真實的數據中，至少可以發現「事實不一致性」的問題，從而提出對官方論點的挑戰。



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進行「內容分析」才有可能。本文作為大陸社會情勢「探索性」(exploratory)的分析,目前也只能「立意取樣」的採用中國大陸最具社會情勢研究「權威性」,以及被學界引用最為「廣泛性」^②的材料,例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表的「社會情勢分析報告」(俗稱藍皮書),國家統計局的年鑑資料,以及報章雜誌的個案報導,如「法輪功事件」作為本文分析的樣本。

架構方面,過去對於大陸社會情勢的分析,學界確實也曾提出過一些觀點。譬如一般常用的人口問題、治安狀況、社會風氣與天然災情為主要議題的分類法;另外一類具有系統意涵的分析架構則以劉平鄰教授提出的「向心力」、「離心力」與「社會動亂」的概念關聯較具有啟發性^③。應用在中共「社科院」社會發展指標中的社會結構、人口素質、經濟效益、生活質量等等社會秩序的分類,就是屬於「向心力」概念的代表;社會問題、社會異議團體、社會運動等等向現政權生存挑戰事件的分類則是屬於「離心力」概念的代表^④。至於傳統社會情勢分析的屬性,則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治安情勢、社會穩定情勢分析息息相關。中共現有統計數據中的社會治安概念,如刑事事件發生率、各種災變事故發生率,屬於「向心力」的面向;至於群眾抗議事件(如四川農民抗議「白條」事件)等,具有「離心力」社會動亂指標意含的,卻常只有個案性的新聞披露而沒有系統性的統計數據。

從實證方法的角度來看,社會情勢指標的背後實在應該具有理論觀點或者參考架構的支持。可是長期以來中共「社科院」與「國家統計局」所制訂的「社會發展指標」與「社會穩定指標」卻並不具有與「社會動亂」因果關聯的理論架構關係。舉例來說,表二的「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指標」訊息固然能夠顯示一九八六年以來中國大陸「社會向心力」的發展趨勢;也能顯示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共致力於「社會治安」(也就是社會秩序)的整治,有很好的成效,由一九九三年排名第十進步到一九九四年排名第二;一九九五年的社會治安成績更進步到排名第五。但是,它的總體排名,卻仍一直排名第十。這種情勢反映了中國大陸的失序情況並沒有隨著時間惡化,但也不能否認「治安問題」仍然是一個社會重要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在分析架構的考慮意義上,單單是觀察表二「社會發展指標」上各變數表現的優劣,也只能有對於「政權向心力大小」的描述作用,卻並不一定能夠對挑戰大陸政權的「社會動亂」提出一個「因果關係」的解釋。表二同時顯示了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指標各分項的年增率變化。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指標的平均年增長約為百分之七^⑤。可是這個數字本身對於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的解釋,並沒有提供太多的「社會情勢」意義。

註② 可以參考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中「社會發展藍皮書」被引用的次數。

註③ 國內情勢分析單位未出版之「大陸社會情勢」學術會議之討論稿。

註④ 以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每年出版之社會情勢分析與預測(俗稱「社會藍皮書」)為代表;另請參看鄭杭生等著,《社會指標理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一九八六)。

註⑤ [其計算公式為 $(1+7\%)*9=1.84$], 而不是「國家統計局」在一九九六年的報告中,因數學計算錯誤[錯誤的把九年總增長比例除以 $0.84(84\%) / 9 = 9.3\%$], 而說成的百分之九。此處我們再度發現了中共官方數據的「誇大、灌水」與統計資料的「內在不一致性」。



表二 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指標之歷年排名次序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86 以來 總排名
總指數	100	105.2	113.6	104.9	114.3	128.3	140.7	153	169.1	185.9	
年增長		5.20%	7.98%	-7.66%	8.96%	12.25%	9.66%	8.74%	10.52%	9.93%	
經濟	12	13.9	15.9	12.7	15.9	18.5	22.2	30.8	40.1	50.1	1
年增長		15.83%	14.39%	-20.13%	25.20%	16.35%	20.00%	38.74%	30.19%	24.94%	
排名/總排名		2	2	8	1	3	2	1	1	1	
環境	9	9.9	10.3	10.2	11.9	15.1	15.6	16.8	18.5	20.4	2
年增長		10.00%	4.04%	-0.97%	16.67%	26.89%	3.31%	7.69%	10.12%	10.27%	
排名/總排名		3	7	5	4	1	8	3	3	4	
社會保障	9	9.7	9.9	10.4	11	12	13.7	15.5	17	18.4	3
年增長		7.78%	2.06%	5.05%	5.77%	9.09%	14.17%	13.14%	9.68%	8.24%	
排名/總排名		7	9	1	7	7	4	2	5	5	
人口	10	10.8	11.5	11.8	12.2	12.4	15.4	16	16.8	23.1	4
年增長		8.00%	6.48%	2.61%	3.39%	1.64%	24.19%	3.90%	5.00%	18.46%	
排名/總排名		6	6	3	8	10	1	5	7	2	
科技教育	12	13.1	14	14.2	16.4	18	18.2	18.5	19.5	17.6	5
年增長		9.17%	6.87%	1.43%	15.49%	9.76%	1.11%	1.65%	5.41%	4.76%	
排名/總排名		4	5	4	5	6	9	7	6	8	
文化體育	9	9.8	10.5	10.3	11.1	11.6	12.2	12.5	13.1	14.7	6
年增長		8.89%	7.14%	-1.90%	7.77%	4.50%	5.17%	2.46%	4.80%	2.08%	
排名/總排名		5	4	6	6	9	7	6	8	9	
衛生保健	10	11.6	11.4	11.8	9.6	10.6	12.2	13.1	14.4	13.1	7
年增長		16.00%	-1.72%	3.51%	-18.64%	10.42%	15.09%	7.38%	9.92%	0.00%	
排名/總排名		1	10	2	10	5	3	4	4	10	
收入分配	10	8.9	11.4	8.5	10.2	11.7	12.8	12.4	12.4	14.3	8
年增長		-11.00%	28.09%	-25.44%	20.00%	14.71%	9.40%	-3.13%	0.00%	15.32%	
排名/總排名		9	1	9	2	4	6	9	9	3	
勞動就業	10	10.7	11	10.6	10.9	13.1	12.4	12.2	12.2	12.8	9
年增長		7.00%	2.80%	-3.64%	2.83%	20.18%	-5.34%	-1.61%	0.00%	4.92%	
排名/總排名		8	8	7	9	2	10	8	9	7	
社會治安	9	6.5	7.3	4	4.7	5	5.5	4.7	5.5	5.9	10
年增長		-27.78%	12.31%	-45.21%	17.50%	6.38%	10.00%	-14.55%	17.02%	7.27%	
排名/總排名		10	3	10	3	8	5	10	2	6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發展報告，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七年各期彙整而成。

若把「向心力」、「離心力」與「社會衝突」之間的變數關係聯繫起來，就發生了「因果解釋」的邏輯關聯性。一般相信，社會發展（向心力）會減低社會動亂的發生；而社會不穩定（離心力），則對社會動亂具有激化的作用。向心力與離心力兩者的角力對於中共政權的興衰會有一定的影響。儘管中共研究學派之間不同的觀點取向（如極權主義、市民社會、國情分析與新制度論），常因立場不同而有研究議題選擇上的差異，不過「情勢分析」途徑卻是這些不同理論觀點之間的最大交集。「情勢分析」必須以「影響政權力量消長的社會勢力」研究為參考。而社會治安、社會動亂、群眾運動、革命則被視為通向「情勢分析」的「參考指標」，也是「區域研究」學界對中國大陸社會「情勢問題性」終極關懷之核心所在²⁷。

另外一個與劉平鄰提出的「向心力」、「離心力」觀點相類似的「社會穩定」觀點，在一九九五年底也由大陸學者所提出。張明澍提出了一個與中共「社科院社會研究所」不同的看法，不論在方法論上或是實際解釋力上，都具特色²⁸。張明澍認為，「社會穩定」有兩種思路：

第一種思路是政策分析途徑。此一思路的邏輯是去尋找：「到底什麼因素引起不穩定」，而那些東西就是「社會不穩定因素」，然後再把那些因素按輕重緩急排出順序來。要消除社會不穩定，就要消除這些因素。目前，社科院所作的就是這樣（參見表二）。張明澍說，這些傳統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依序包括了通貨膨脹、腐敗、社會治安、貧富差距、民工潮、教育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等等²⁹。

可是造成這些不穩定因素的根本原因，「歸根究底，可以追溯到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政策」。因為「改革政策」帶來了通貨膨脹、腐敗、社會治安、貧富差距、民工潮等等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可以通過調整政策得到解決，從而求得政策性的穩定，譬如減小國企改革的力度以減緩失業；限制物價改革以降低通貨膨脹；恢復戶口制度以減少流民；恢復階級鬥爭以杜絕「向錢看」心理等等。換言之，依據「社科院」的看法，要徹底消除中國大陸目前存在的社會不穩定（通膨、腐敗、治安、貧富差距、民工潮…），只要像從前一樣，停止推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政策」就可以完成。可以想見，中共不會採取這樣的政策，於是社會穩定度就不會增加，而社會治安情勢就不會改善。

第二種思路是結構分析途徑。其基本邏輯是：「什麼是保障穩定的因素」，那些因素和大陸的社會結構是息息相關的。在大陸，保持社會穩定的兩大基礎是：

1. 一切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除了五千四百萬名黨員在所有的社會組織中之外，還有支持共產黨的八大黨派，也是社會穩定的力量；此外，其他社會政治組織，如共青團有六千一百五十萬團員、少先隊員、全國婦聯成員、所

註²⁷ 此處「向心力」與「離心力」是自變項，政權力量消長是依變項。

註²⁸ 參見張明澍，中國政治人：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註²⁹ 同前引書。



黨的力量，…這是中國政治結構的特點，對分析和預測中國社會的穩定，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2. 有一個覆蓋整個社會的、比較嚴密的行政系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所屬的單位，整個中國社會就是由大大小小、縱橫交錯的單位構成的一個系統，就是個體戶現在也有「個體勞動者協會」，起著單位的作用。這兩個系統，一個是社會組織的系統，一個是行政組織的系統，覆蓋了社會的大部分吸納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很少有游離這兩個系統的力量，更沒有組織的政治力量。這兩個系統有其物質力量作為後盾，使其具有世界上任何其他政黨都不可比擬的社會動員力、社會控制力和社會穩定力。在大陸，「結構性穩定」的力量遠遠超過「政策性不穩定」的力量。

因此，觀察大陸的社會穩定，除了「政策性的社會不穩定指標」之外，「結構性的社會穩定指標」就更重要。譬如，「單位」的資源分配能力是否降低；個人對於「非單位性」組織的選擇機會（如個體戶、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是否加大；執政黨控制社會的能力是否下降…這種結構性的不穩定，才是社會穩定的真正威脅。

吾人將上述兩種架構加以綜合，可以得出：中國大陸的社會情勢應以影響「政權消長」的「社會勢力穩定因素」為觀察重點；影響社會發展的「向心力」自變數包括：以政策性的發展指標為代表，如行政資源、國企效率、社會保障、衛生保健、文化體育、人口、收入分配、勞動就業，等；而「向心力」的依變數則包括與社會秩序有關的刑事案件、社會治安為代表。

影響社會動亂的「離心力」自變數以結構性的（不）穩定指標為代表，如、經濟領域的「私營、個體、合營企業」成長趨勢；政治領域的「非共黨派」成長趨勢；社會領域的「家族、宗教、知識文化聯合體」成長趨勢；而「離心力」的依變數則以以威脅政權的集體行為、群眾抗議、暴動、政變、革命為代表，包含了真實爆發群眾抗議的件數與範圍。表三揭示了此一社會勢力概念架構的理論與變數關係。

表三 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的分析架構

是否支持 現有政權	相關理論	自變項	依變項
向心力 (是)	社會發展理論	以政策性的發展指標為代表，如行政資源、國企效率、社會保障、衛生保健、文化體育、人口、收入分配、勞動就業，等。	社會秩序 以社會發展中的刑事案件、社會治安為代表
離心力 (否)	社會穩定 社會運動 革命理論。	以結構性的（不）穩定指標為代表，如、經濟領域的「私營、個體、合營企業」成長趨勢；政治領域的「非共黨派」成長趨勢；社會領域的「家族、宗教、知識文化聯合體」成長趨勢	社會動亂 以威脅政權的集體行為、群眾抗議、暴動、政變、革命為代表，包含了真實爆發群眾抗議的件數與範圍

本表資料由第二、三、四節內容討論整理而成。



本表資料由第二、三、四節內容討論整理而成。

五、社會勢力中的「向心力」與「離心力」

爲了釐清中國大陸社會勢力中「向心力」與「社會秩序」概念之間的因果關係，本文作者曾將社會發展指標中的九項（治安除外）定義爲「向心力」（自變項）；將社科院建立的「社會穩定指標」中的社會治安變數定義爲「社會秩序」（依變項），進行過一次「社會安定」情勢的定量分析^②。結果如表四，發現：過去十幾年以來，影響大陸社會情勢最重要的「向心力」因素是1、收入分配；2、經濟發展、而不是中共官方政策與宣傳媒體所主張的「失業問題」^③。此項發現一方面印證了朱鎔基採用經濟發展手段解決社會矛盾策略的正確性（見一九九八年國情報告）。另一方面也爲歷年來主張「縮小貧富差距、鞏固政權」的「保守派」提供了數據的基礎。說明了過去幾年來，何以主張經濟發展的「改革派」與主張社會均等的「保守派」仍有路線爭論的空間。

表四 一九八六年以來中國大陸社會發展與社會動亂指數年增長的相關分析

	總指數	經濟	環境	社會保障	人口	科技教育	文化體育	衛生保健	收入分配	勞動就業	社會治安
總指數	1.00										
經濟	0.86	1.00									
環境	0.61	0.37	1.00								
社會保障	0.39	0.51	0.08	1.00							
人口	0.24	0.17	-0.32	0.44	1.00						
科技教育	0.33	0.18	0.69	-0.44	-0.39	1.00					
文化體育	0.55	0.44	0.35	-0.11	0.04	0.67	1.00				
衛生保健	0.02	-0.02	-0.12	0.56	0.27	-0.55	-0.08	1.00			
收入分配	0.74	0.48	0.41	-0.17	0.21	0.46	0.51	-0.45	1.00		
勞動就業	0.40	0.08	0.87	-0.18	-0.34	0.58	0.28	0.05	0.33	1.00	
社會治安	0.84	0.63	0.42	0.08	0.25	0.38	0.48	-0.31	0.87	0.18	1.00

資料來源：同表二，表中數字爲積差相關係數。

上述分析結果的有趣之處在於，與社會秩序關係密切的社會治安情況的改善與中共最近最爲關切的社會保障（.08）和勞動就業（.18）的關係卻最淺。上兩項數據顯示，如果中共當局對於「居民收入分配」（以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爲表現），以及「經濟發展」（經濟成長率「保八」的問題）處理不當的話，社會治安會較差而社會動亂會加劇；反之，就算把「工人下崗」後的「社會保障」與「再就業工

註^② 歐陽新宜，“1998年之中國大陸社會問題”，問題與研究（日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號（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頁八〇~九九。

註^③ 參見表一

程」，也就是「勞動就業」問題處理得很好，對於中國大陸的「社會秩序」、「社會治安」與「社會穩定」，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這個發現佐證了「官方報導的社會情勢」與「客觀發現的社會情勢」之間的差距。

作為中國大陸社會情勢分析架構中的「離心力」面向，威脅政權生存的集體行為、群眾抗議、暴動、政變、革命，是重要的分析單元，質言之，也就是「社會（不）穩定度」的分析。社會穩定的概念與政治穩定概念一樣，是一個正常運作體系賴以維繫的「規範性期望」。在任何正常的狀況下，政治社會的主流勢力（政權），都會默認、宣揚或追求此一「道德性」或「合法性」的目標，譬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或「政績卓著」之類的用語。然而，實際狀況卻常與「規範性期望」有所不同，因此，對於「主流勢力」產生威脅的「社會不穩定」與「政治不穩定」因素，才成為當政者或學術界探查「現政權」或「正常社會體系」是否持續的主要興趣。也因此，學界通常只對於政治社會的「不穩定」狀態提出指標性的理論研究，卻並不對社會穩定或政治穩定，提出指標性的理論研究。譬如政治學對於政治穩定的分析就是如此。政治學對於政治穩定的測量一直是以致命暴力的發生、政變、政治謀殺、暴動、叛亂、鎮壓、暴力鬥爭、政治制度更迭（憲政）、政治人物更迭等等為指標^②。

傳統的社會學探討「穩定」的議題至少可以有兩類觀點。功能論者認為「社會穩定」與「社會體系的均衡」一樣，同屬於「規範性期望」的概念。派深思（Parsons）認為生態環境、文化人格、經濟資源與生存目標（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Latent）是探討社會體系均衡與否，也就是探討「社會變遷」的主要「模式變項」（pattern variables）。然而，社會變遷的實際面卻遠非「規範性期望」所能涵蓋^③。不消說，衝突論者的始祖馬克斯不僅認定經濟因素（生產力）與社會因素（生產關係）是社會均衡的主要破壞者，更認為「社會不穩定」（唯物辯證）是歷史發展的正常與必然現象。社會現實中的病理、偏差、解組、衝突，甚至動亂佔據了實際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知社會穩定與社會動亂乃是概念上的一體兩面，對於現政權不穩定的因素，可能正是孕育新政權的因素。換句話說，在概念上探討社會穩定，其實就是探討「社會不穩定」。指標性的社會情勢研究更是如此。

由此可知社會不穩定的理論概念和社會發展的理論概念恰巧就是「社會變遷」概念的一體兩面。他們站在對於現政權是否支持的兩側。社會發展的議題一如表二所列的指標項目，是屬於支持現政權社會情勢的「向心力」的面向；而社會不穩定的議題則是反對現政權社會情勢的「離心力」面向，也是中共學界較少觸及的領域。應用社會問題^④、社會運動與革命的理論，我們試圖將這些「離心力」面向的社會學關懷

註^② 請參考朱堅章等譯，政治科學大全，總體政治理論，第一章：政治發展（台北：幼獅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

註^③ 請參考黃瑞祺編譯，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選讀（台北：巨流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

註^④ 作者認為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觀點適合於一般比較社會學或「基礎社會分析」，而不是「情勢分析」或「中共研究」探討的主要興趣。



作些探路。這是本文在分析了大陸社會情勢的「結構崩解論」（如十年動亂循環論的主張）與「社會發展論」向心力面向之後，再進行社會運動與革命分析的主要原因。

六、「法輪功事件」與資源動員論

資源動員論的分析架構：

如何在上述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的分析架構下，用一個適切的理論觀點去看待目前發生的「法輪功事件」呢？「法輪功」對中共而言到底是向心力因素呢？還是離心力因素？是社會發展的助力呢？還是社會穩定的阻力？社會運動理論能不能解釋「法輪功事件」的發生，並且預測它的發展走向？從社會運動的理論來看，Smelser的集體行為論（Collective Behavior, 1963）；Johnson的革命變遷論（Revolutionary Change, 1966）；Vablen的地位不一致論（Status Inconsistency）；Janos的國際差示效果論（International Demonstration Effect, 1986）；和Gurr的相對剝奪論（Relative Deprivation, 1969）屬於遠因性的與宏觀性的社會結構解體理論。這些理論對於法輪功群眾運動發生的遠因，如伴隨經濟開放政策所導致的收入不均、貧富差距、失業問題甚至「集體信仰失落感」可能都有相當程度的解釋效力。如果有豐富的社會發展數據，像「逢九必亂」的社會動亂循環論也許可以得到「結構崩解論」式的支持。可是上述觀點對於「法輪功事件」發生的近因，譬如「國際環境」的改變、「民間勢力」的興起、中共黨內各派或黨外各團體在「江朱」體系之外利用民族主義爭取路線地盤而導致的互動衝突，就不得不轉向資源動員論去尋求解答。

資源動員論採取的是歷史情境與人文互動的探研方式。例如Brinton（1938）；Eisenstadt（1978）；Goldston^⑤（1980）就極為關切每次事件發生的歷史步驟，不僅歸納行動類型，並且特別重視各勢力領導人（elite）在革命過程中的自主因素（autonomy）。Moore（1966）與Tilly（1978）在領導人之外，更進一步強調組織與策略因素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譬如Moore就認為歐洲各種新政體的產生與當時革命者所採取的階級聯合（Class Alliance）的策略有莫大的關係。Tilly跨越階級的概念，認為任何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皆可在社會運動中發揮團體統戰（Group Coalition）的作用。Skocpol（1979）分析了中國、法國與俄國的革命歷史之後，把環境適應說與資源動員說結合起來，指出：改革者（當權者）若是不能肆應國際政經勢力的挑戰，激憤的農民和其他階級精英代表的聯合，就會把現有政權推翻。

註⑤ Jack Goldstone "Theories of Revolution—The Third Gen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32 no. 3 (1980) pp. 424~453; S. N. Eisenstadt, *Revol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社會運動的成功條件：

資源動員論的學者不會像「經濟決定論」的學者一樣，採取「經濟政策」決定「社會動亂」的「逢九必亂」論去解釋「法輪功」群眾運動的問題。他們一貫強調的焦點是：1. 對立團體的區分，譬如「法輪功」的政治屬性為何？是改革派、保守派還是反共團體？（Eisenstadt, Skocpol 的觀點）；2. 組織的嚴密程度如何？以及3. 合縱連橫的策略運用為何？（Moore, Tilly 的觀點）在資源動員論者的眼中，團體（Group）派系（Faction）和階級（Class）之間的聯合（Coalition），同盟（Alliance）和策略（Strategy）是構成常規性（Routinized）政治參與（如議會鬥爭、黨內路線之爭）和非常規性（Non-routinized）的政治參與（如街頭運動）的主要觀察變數。至於一項成功的社會運動，根據這些學者的觀察，則須具備下列條件：1. 高度集權的層級式組織，2. 明確的行動目標，3. 有可選擇性的籌碼，4. 可靠的外援，和5. 實施暴力的準備（Gamson, 1975；Orum, 1983.）^⑥

從資源動員論的角度來看，十年前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學生團體在這些條件下的不足所致。十年前的中國大陸情勢與今日主要的不同點在於國內的「保守派」勢力仍然極大，而改革派的強人鄧小平仍然在世。當時改革者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乃是引用各團體精英參與政治的速度和順序的問題。就黨內二派的鬥爭來說，鄧小平的幹部四化政策顯然犯了德國學者馬漢所謂的「過度同化」問題。那就是，新人在短期內大量湧進統治階層，而老人的離退又沒有相對的社會經濟地位保障（Rigby, 1983）結果導致了統治精英內部的新舊之爭，且使體系的目標和政治意識型態模糊變質。

就黨外反精英（counter-elite）的學生民主運動抗爭來說，Lasswell和Kaplan就曾指出：黨外反精英在其勢力最小及勢力最大的階段，最可能提出革命性的要求（1950: 267）。回顧中共的改革，黨外反精英在經歷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事件的挫折，在正規的政治參與管道受阻之後走向街頭，原是極其自然的事。不自然的事是這些知識份子的動員策略與能力。拿上述成功的社會運動五項條件來評估當時天安門事件的主角--北高聯，竟然沒有一項符合。首先，北高聯和教師知識界，工人，其他外地學生團體的聯繫就不緊密，和趙紫陽的聯合關係也沒有被充分運用；空泛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的訴求目標並不明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更使得談判失去彈性；沒有明確的外援，只有國際新聞媒體的心理安慰；最後，沒有以戰爭迎接和平的心理防衛。用這樣的抗爭策略去與從群眾運動起家的共產黨（鄧小平）交手，不敗者幾希。

「法輪功」具有成功社會運動者的屬性嗎？就目前文獻顯示，「法輪功」團體崛起的過程、組織的性質及事件的始末如下：

註⑥ William A. Gamson,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Ill.: Dorsey, 1968) ; Anthony M. Orum,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83) .



表五 「法輪功事件」

● 領導人：李洪志，1952 生，中等知識份子家庭，1996 年前任職於吉林糧油供應公司
● 創立：1984 創立法輪功，1991 開始對外傳功；1996 因中共打壓赴美；1998 至紐約定居
● 主要著作：「轉法輪」、「中國法輪功」、「法輪大法義解」、「神通大法」，在國外被譯為多國文字，售出一百多萬本；在美加地區非華人學員就達千餘人
● 學說主旨：以「真、善、忍」，修習宇宙大法
● 傳習方式：修性讀書，放下執著；修命練功，轉法輪成金剛不壞之身
● 練功效果：用人體本身瞭解宇宙，從物質及生命起源開始，探究各項宇宙結構與運行原理；讀後能通心靈、明道理；練後能治關節炎、腰痛、失眠，等等
● 理論特性：動靜結合、平穩安全；理論系統清楚明白；自願組織，堅持不墜
● 組織型態：各地以練功站、研究所、輔導站為名招募學員，有師傅、協調員、輔導員；每站二、三十人不等，各有基地和資金來源
● 參與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陸：離退休幹部（包括軍隊公安人員）、中老知識份子、農民居民、中老女性，估計全大陸有約六千萬至一億人。 ■ 北美：高學歷（碩博士）大陸留美學者為主，以各地大學為基地，成立研究班，設立電腦網站，電台；組織範圍達全美 38 州及加拿大各地。 ■ 台灣：1995 年開始由鄭姓夫婦引進，目前有 101 場，七八千人，參與者社會各層次都有。 ■ 香港：30 練功點，二千多人。 ■ 大馬：十多餘學習站，二三百人。 ■ 新加坡：96 年註冊為合法組織，李洪志蒞會，目前有四十個練功站，千餘人。
● 中共態度：公安部曾於 1995 年訂為「邪教」；1996 年查禁李洪志出版物，撤銷中國氣功協會會員資格；4 / 27 日，國務院：意圍聚方式表達意見是「完全錯誤的」；藉練功之名危害社會穩定者，「要依法處理」。國務院已將「法輪功」定性為「並非無政治性的有思想組織」。
● 事件始末：四月中科院研究員何祚庥在天津師大撰文「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三次否定法輪功之價值；
● 4 / 19 日數十名修練者至天津師大抗議；
● 4 / 24 日抗議者增至五千餘名；其中數名修練者被公安部門扣查；天津修練者於是聯絡北京、河北練功站，約好齊赴中南海「討個說法」；
● 4 / 25 上萬名練功者聚集中南海，或站或坐，寧靜示威，要求：1、放人；2、書籍解禁；3、平反「邪教」指控。結果：天津公安部門放人、但是其他要求將於三日後答覆；群眾是夜解散，街道清理整潔，片紙不留。
● 4 / 27 日，國務院答稱：不同意圍聚方式表達意見；藉練功之名危害社會穩定者，依法處理。
● 4 / 30，全國各地仍有練功者赴官署抗議者，如南京一地就有六百多人。
● 5 / 22，據稱北京及天津地區學員將於是日為李洪志生日慶祝，在北京西郊香山舉行「大法會」，預計有數萬人參加。
● 佛教態度：陳星橋，哈爾濱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具有民間宗教性質及濃厚意識型態內容的新型現代迷信和附佛外道。反對其功法和教理，但不反對其弟子。」

資料來源：由一九九九年六月以前之大陸、台、港、新加坡各地報紙雜誌整理而來。



由於目前資訊尚少，還不能作全面的評論，不過就其規模及組織形式而言，法輪功至少已經具備了「民間社會團體」的雛形。在已有資訊可判斷的部分：首先是「團體定性」問題。四月二十七日法輪功代表在會見國務院「信訪」官員時強調他們是「非政治組織」，但當局經調查後仍將他們定性為「不與黨的利益一致的」、「有思想的組織」。2) 其次是組織問題。據調查，「法輪功」成員在包圍「中南海」後，中共當局才發現法輪功組織之嚴密，不是練功者很難打聽到什麼消息；在傳遞示威抗議動員令時，極其保密，甚至家人也不知親人去向。抗議的數萬名信徒，「說聚就聚、說散就散」，其動員組織能力，「震懾中共中央」^⑦。3) 在思想方面，法輪功的主要著作有：轉法輪·中國法輪功、法輪大法義解、神通大法，在國外被譯為多國文字，售出一百多萬本；在美加地區非華人學員就達千餘人；其學說主旨：以「真、善、忍」，修習宇宙大法；其傳習方式：修性讀書，放下執著；修命練功，轉法輪成金剛不壞之身；至於練功效果：用人體本身瞭解宇宙，從物質及生命起源開始，探究各項宇宙結構與運行原理；讀後能通心靈、明道理；練後能治關節炎、腰痛、失眠，等等。由於其理論特性：動靜結合、平穩安全；理論系統清楚明白，因此能夠形成自願組織，堅持不墜。

至於「法輪功」的社會階層屬性則還有待觀察。從「法輪功」的參與者身份判斷，如離退休幹部（包括軍隊與公安人員）、中老知識份子、農民、城市居民、中老女性，估計全大陸有約六千萬至一億人，這已是一個「龐大社會團體」的大集合。他們是否具有馬克思對無產階級者形容的「被剝奪失意者」色彩，是否具有「無產階級意識」也必須澄清。他們會不會成為「保守派」意識型態的社會群眾基礎，可以被像鄧立群等「左王」的保守派集團所運用，作為攻擊「改革派」的工具，有待觀察。

在同盟策略方面，海外高學歷（碩、博士）的大陸留美學者，以各地大學為基地，成立研究班，設立電腦網站，電台，其組織範圍達全美三十八州及加拿大各地。這項「失意農民」與「知識份子」的結合，將會是 Skocpol 指出的「激憤的農民和其他階級精英代表的聯合，就會把現有政權推翻」的翻版。策略選擇的籌碼上，「法輪功」是否有與中共「談判」的本錢，譬如是否可以承擔長期靜坐示威（不合作主義）的社會成本？在外國援助的部分，吾人需探查的是「各基地資金來源」是否為海外匯入？創辦人李洪志個人著作、海外捐款、非華人學員能否吸引如「六四」時期的海外媒體以及國外民意的同情？最後則是「法輪功」團體是否具有「對抗暴力的準備」？如果中共採取如「六四」天安門事件一樣的「鎮壓」行動，「法輪功」團體成員能否「抵死不從」？

根據「資源動員論」的分析架構，加上上述五個條件的觀察，我們才能進一步評估「法輪功」團體是否具有「自主性」民間團體的屬性；在策略同盟的地位上是屬於「左派」、「右派」還是「反革命派」；如果此一「具有民間宗教性質的社會運動」成功了，中國大陸在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甚至政治參與的問題上是否可

註⑦ 中國時報，八十八年五月十九日，第十四版；另中共已於七月二十日全面禁止法輪功的活動，宣佈法輪功為非法組織，並在全大陸對法輪功負責人與輔導進行大逮捕。然而此一事件的發展並不因此而落幕。



以大進一步；而「市民社會」的出現是否也就不遠了呢？

七、社會動員情勢分析架構的探索 — 代結論

探索中國大陸社會動員情勢的分析架構，並尋求解釋情勢變數之間的「精要式」（parsimonious）因果關聯，是本文探索性研究的努力方向。由於現成的文獻分析不能達到這個目的，而且容易被中共官方文件誤導，因此必須另闢蹊徑。譬如，根據中共的官方報導，近年來中國大陸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一直被認為是運行機制矛盾、失業問題、貧富差距、腐敗問題與城市治安，等等。可是最近的報刊文章又指出，胡鞍鋼認為大陸的社會動亂具有每十年一次的「週期性」，江澤民與朱鎔基在九次人大會議上則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來自經濟問題的多，來自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因素更多^③。由於中國大陸強烈的官方政策動員色彩，以及派系鬥爭時成為動員工具的一部分，常使得社會動亂的結構性因素與政策性因素膠著模糊或有相互矛盾的現象。本文以文獻對照及實證數據的方式指出這些誤導的現象。

因此我們期待一項健全的大陸社會情勢「因果分析架構」。其中，使用「向心力」與「離心力」的「社會勢力」概念去探討「政權維繫」正反因素，是一個同時兼具「社會結構模式」與「菁英策略模式」的啟發性的研究架構。本文引用一個以社會結構發展指標為根據的暫時性趨勢分析發現：過去十幾年以來，影響大陸社會動亂最重要的「向心力」因素是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而不是中共在近年最為關切的「社會保障」因素和「勞動就業」因素。如果中共當局處理「收入分配不均」和「經濟發展」不順利的話，社會治安就會有較差的表現。相反的，從目前被重視的政策方向研判，中共即使把「工人下崗」後的「社會保障」問題與「再就業工程」都能處理好，對於改善社會治安、減低社會衝突，增進政權的向心力可能也沒有太大的幫助。

在「離心力」的研究方面，以「菁英策略模式」為範疇的社會「資源動員理論」是一個值得參考的視角。利用此一觀點，西方學界最近在恐怖主義事件、群眾抗議、社會運動甚至革命的議題上，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經驗。他們歸納法國、英國、美國、俄國、清末中國的革命經驗和多國現代抗議運動的模式，發現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符合下列五大條件：領袖人才、組織嚴密性、運動口號與目標、有選擇性的行動資源、同盟策略、外在援助以及接受暴力鎮壓的準備。這個觀點對於「六四」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何以失敗的分析，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雖然已知的資訊尚少，採用資源動員論的觀點對「法輪功事件」進行初步分析的目的仍然只是理論與架構上的興趣。暫時性結論是：「法輪功團體」是一個「半宗教民間性質」的「自發性」團體。他們具有成功社會運動的條件，但也有被「中共保守派」運用作為路線鬥爭工具的可能^④。此一團體能否發展成為完全自主性的「民間勢

註③ 江澤民與朱鎔基在九次人大上的講話，見註②。

註④ 中共七月二十二日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行動，使「路線鬥爭工具」的可能性降低，卻反而增強了「非共自主性勢力團體」出現的機會。



力團體」，將有賴於他們的同盟策略、外力援助以及是否有接受暴力鎮壓的準備與堅持到底的決心。如果他們成功，將會是孕育中國大陸「市民社會」的第一個「非共勢力」團體。屆時，中共社會情勢的社會穩定指標與研究架構，將會逐漸脫離以中共政策為主導的「動員性社會」性質，而可能會與其他民主社會的情勢分析標準，例如社會變遷的一般理論和與社會問題的一般觀點，趨於一致。

* * *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Chaos in China—On the Fa-lun-kung Incident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Hsin-yi Ou-y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Mainland China's social chao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break-down” or the theory of “resources mobilization”. While Chinese officials favor the structural break-down perspective, putting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chaos on policy consequences and using market economic reform as escape goats,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emphasize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resources mobilization theory”. Western scholars demarcate the resources mobilizer of Chinese social movements into pro-government and anti-government, and proclaims that most of the social movements seen on Chinese media are government initiated.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statistical data, the author has found various textual and logical inconsistencies in China's official reports on social situation. These inconsistencies reveal the government's endeavor to set agenda and to mobilize resources. Therefore students of China studies should be more suspicious about these official materials and be more cautious in selecting approaches. In this paper, on going “Fa-lun-kung incident” is used as example for testing and searching for a research scheme for China's social movement. Whether or not the “Fa-lun-kung” movement would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autonomous social force that surfaced from the society as opposed to the state depends on the mobilization strategy of the movement.

Keywords : social situation, social turmoil, social chaos, social movement,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Fa-lun-kung incident”, autonomous social force

